

# 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图书馆学智慧

■ 蒋永福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目的/意义]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图书馆发展史。在中国古典文献中记录有极其丰富的图书馆实践智慧和思想智慧。分析和归纳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图书馆学智慧,是梁启超所言“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方法/过程] 利用价值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分析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思想的构成。[结果/结论] 归纳出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图书馆学智慧的五个方面的构成,分别是:文以载道,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文献价值观;藏书以传道,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价值观;治书以供治学,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功用观;爱书须传布,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藏书流通观;馆职为美职,集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职业价值观。

**关键词:** 图书馆学智慧 古代 中国

**分类号:** G250

**DOI:** 10.13266/j.issn.0252-3116.2020.18.001

毋庸置疑,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图书馆发展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古代中国人积累有极其丰富的图书馆实践智慧和思想智慧。梁启超曾说:“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它,……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种学问却是发达得很早。”<sup>[1]</sup>从梁启超的这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三方面的信息:中国的书籍史与欧美国家的书籍史迥然有异,从中国书籍史的特征出发去研究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就,就能产生出“中国的图书馆学”;从梁启超所言“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它”一语看,其所称“中国的图书馆学”指的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从时间界限上说应该是指先秦至清末时期的图书馆学;中国古代无“图书馆学”之名,但却有着悠久的关于图书馆的学问。古代中国人的这种关于图书馆的学问,就是本文所称“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智慧”。

中国古代无疑有着极其丰富的图书馆学思想,但中国古代从未有人对图书馆学思想做出条理化的、形式化的、体系化的综合与归纳。这是由中国古人重个体直觉而不重系统论证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诚如哲

学家张岱年先生所指出,“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中国思想家的习惯,即直接将此所悟所得写出,而不更仔细证明之。……中国思想家并不认为细密论证是必要的;反之,乃以为是赘疣”<sup>[2]</sup>。张先生这段话是针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思维特征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描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思维特征。如果按照现代人的习惯性理解,能够称得上“思想”的东西应该具有一定的形式化的逻辑范畴的有序组合特征,但中国古人不追求这种形式化的逻辑思维,而是习惯于将自己的“所悟所得”直接写出,从而使“思想”处于各说各的散论状态。然而,就是在这种散论话语中蕴藏着直觉思维所特有的灵感与智慧。如果说现代图书馆学具有明显的“理论理性”特征,那么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则具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特征。作为理论理性的“思想”,以抽象性、逻辑性、体系性为特征,而作为实践理性的“智慧”,则以具体性、直觉性、灵动性为特征。所以,中国古代人关于图书馆的学问,与其称之为“图书馆学思想”,不如称之为“图书馆学智慧”。本文将从文献价值观、馆阁价值观、馆阁功用观、藏书流通观、馆阁职任观等若干层面窥探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智慧。

**作者简介:** 蒋永福 (ORCID:0000-0002-2499-9539),教授, E-mail:jiangyongfu916@163.com。

**收稿日期:**2020-04-16 **修回日期:**2020-05-25 **本文起止页码:**3-14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 1 文献价值观:文以载道

简单且直观地说,收藏文献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即图书馆因其藏有文献才成其为“馆”。所以,要想确认图书馆的价值,首先要确认文献的价值;文献的价值决定图书馆的价值。综观中国古代学术史,可以肯定,中国古人是在“文以载道”视域中确认文献之价值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人有着悠久的“文以载道”思想传统。“文以载道”一语来源于北宋周敦颐所言“文,所以载道也”。但是,“文以载道”的观念早已有之,如南北朝时期的刘勰言“圣因文而明道”,唐代的柳宗元、韩愈都曾言“文以明道”。周敦颐之后的朱熹言“文以讲道”,明人王艮言“经(六经)所以载道”,明人薛瑄言“经乃道之精华”,清初人冯班言“不读书,何以知圣人之道”等等,说明“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人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文以载道”中的“文”,其狭义可理解为“文字”“文辞”或“图文”,其广义则可理解为图文作品(包括文章、图画、书籍等),即我们今人所称的“文献”。“文以载道”中的“道”,指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所通用的万事万物之所以如此存在、如此运行的根本原因及其法则。“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概念。哲学家金岳霖在《论道》一书中指出:“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文献与道的关系是:“道”记录在文献之中,“文献”是记录道的形式和工具;“文献”以记录和显现道为目的,“道”借助文献而得以保存、显现和传播。

《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可以说,这段话道出了书契(文书或书籍)产生的历史源由——记录治官治民之道。这也证明了“文以载道”一语的历史真实性。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看来,道是由圣人发现和传播开来的,同时认为圣人之道记载于六经文献之中,这就是中国古代崇圣文化和经学文化长盛不衰的思想根源所在。正因为道已由圣人发现并记载于六经文献之中,所以“崇圣”“崇道”“崇经”几乎可视为同义语,诚如朱棣在《性理大全·御制序》中对“圣”“道”“经”三者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解释:“厥初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已往,道在六经。”可见,道从天地转至圣人再转至六经的过程,就是“道载于文”的过程,也就是上古时期“文以载道”的实现过程。

“道载于文”的过程,用波普尔(K. Popper)的语言

说就是“客观知识”(objective knowledge)的形成过程。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 Cassirer)指出,“一切文化成果都来源于一种凝固化和稳定化的活动。人如果不具有使他的思想客观化并使之具有坚固而持久的形态的特殊能力的话,那他就不能交流他的思想和感情,从而也就不可能生活在社会的世界中”<sup>[3]317</sup>。知识的客观化或思想的客观化,使得知识和思想获得了客观的形态,也就是使知识和思想突破了随着个体生命的消亡而消亡的局限,从而获得跨时空无限存贮和传播的可能。这就是“文以载道”或“道载于文”对人类文明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及其价值所在。

由于“道载于文”,所以读文就可以明道,此即“读文明道”的过程。所谓“读文明道”,实际上就是客观知识主观化的过程,亦即学习的过程。“读文明道”也就是“学以明道”,所以《论语·子张》云“君子学以致其道”;朱熹说“古人读书,将以求道”<sup>[4]</sup>;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sup>[5]</sup>。学习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明道,而读书是“学以明道”的重要途径,诚如苏辙所云“古之知道者必由学,学者必由读书”<sup>[6]</sup>,而读书明道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道载于文”,用东汉王符的话来说就是“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sup>[7]</sup>。王符这里所言“道藏于书”,可以视为后世人们所言“文以载道”的先声。在卡西尔看来,“文”或“书”是符号的世界;人生活在符号世界(文化世界)之中,人所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种符号组成的世界,……除了各种文献或遗迹以外,没有任何事物或事件能成为我们历史知识的第一手的直接对象”,“文献和记录并不是单纯物理的事物,而是必须作为符号来阅读的”<sup>[3]346-347</sup>。把文献“作为符号来阅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读文明道”的过程,而“读文明道”的过程就是卡西尔所说的“符号化操作”的过程,正是由于人能够进行“符号化操作”而成为“符号的动物”<sup>[3]45</sup>。

正因为圣人之道在圣人之书中,所以“文以载道”与上引王符所言“道藏于书”是一回事。由此而言,道与书之间具有了互指或互文的性质。也许此故,南宋学者包恢在《盱山书院记》中指出,“圣贤之书所以明道,书即道,道即书;非道外有书,书外有道,而为二物也”<sup>[8]181</sup>。包恢的这一段话,可从以下两方面理解其意:

其一,圣贤之道在书中,而不在他物中,所以读圣贤之书也就等于读圣贤之道、明圣贤之道;如果没有圣贤所作之书,圣贤之道便无以存、无以明、无以传。由此而言,圣贤之书和圣贤之道之间是一种“等价”关

系,故曰“书即道,道即书”。

其二,圣贤之道的传承,如果撇开口口相传的共时性传播渠道,那么只能借助特定载体进行历时性传播,这种特定载体主要是书(广义上而言就是文献)。若仅从历时性传播渠道而言,人们只能通过圣贤之书才能了解和把握圣贤之道,别无他径。由此而言,圣贤之书和圣贤之道是合二为一的“一体物”,不可分割,故曰“非道外有书,书外有道,而为二物也”。

包恢的“书即道,道即书”命题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中国古人的道器合一思想。在道器合一论视域中,书是载道之器,这里的“载道”一词不仅有静态意义上的承载之意,同时还蕴含着动态意义上的明道、传道之意。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著书、读书、传书的过程,使得道不断得以阐明和传播。反过来说,无书则道无以阐明、无以传播,尤其在历时性传播路径下更是如此。正因道在书中,所以学者明道须读书,诚如南宋欧阳守道所言“学也者,因圣贤之书,求圣贤之心”<sup>[8][18]</sup>。若用海德格尔(M. Heidegger)的存在哲学语言说,道记载于书中,离开书,道无以向人显现;道就是书中文字所显现出来的意义。存在主义大师萨特(J. P. Sartre)说“存在先于本质”<sup>[9]</sup>,其实这句话应该说成“存在与本质同体无间”,即存在与本质同生共存,无所谓孰先孰后。正因如此,二程才说“器亦道,道亦器”<sup>[10]</sup>,也就是说,道与器之间也是同体无间的关系——道不能离器而存在,道与器只能合一而存。对圣人已故后的人们而言,圣人之道存在于书中,书是载道之器,道与书同体无间,所以说“书即道,道即书”。

“道器合一”在理学家那里被称为“体用一源”。理学家程颐在《易传序》中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sup>[11]</sup>“体用一源”与“道器合一”言异义同。在中国古人的思想意识中,任何事物都有体有用;事物的体(属性)通过用(功能)显现出来;体与用之间无所谓孰重孰轻。在“书即道,道即书”命题中,书处于“用”的地位,即书被用于藏道、传道。“以书藏道”和“以书传道”,其实是人类的一大发明,是人类发明文字、纸笔和印刷术后的延伸性发明。能够借助文献(书)来保存和传播知识信息,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关于人的定义:“人类是能够创造并利用文献来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动物”<sup>[12]</sup>。这一定义可称之为关于人的文献学定义。

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里的“物”即指“器”或“器物”。荀子把善于借

助器物的能力视为人的根本特征之一。王夫之说“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sup>[13]</sup>。王夫之这里所言“善治器”,与荀子所言“善假于物”义同。由此我们可以说,人是善于假物治器的动物。人类能够借助文献来保存和传播知识信息,就是善于假物治器的表现。在此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人是懂得“文以载道”的动物,懂得“道藏于书”并“以书传道”的动物。

在道器关系视域中考察文献的功用价值,从而得出“文以载道”“道藏于书”“以书传道”“书即道,道即书”等本体论思想结论,这完全可以视作古代中国人的“文献哲学”或“文献价值论”学说。在这一学说遗产中,蕴藏着中国人善于直觉思维的灵动与智慧,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志于道”“学于文”的优秀品质。

## 2 馆阁价值观:藏书以传道

中国古代无“图书馆”之名。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大多用殿、阁、馆、观、院、楼等建筑物名称来命名。西汉的石渠阁、天禄阁,东汉的东观,隋代的观文殿,唐代和五代的“三馆”(昭文馆、弘文馆、史馆),宋代的“三馆秘阁”(合称“崇文院”),明代的文渊阁,清代的四库七阁,以及名目繁多的历代私家藏书楼、寺观的藏经楼等,即为古代图书馆的名号。自宋代始,人们把藏书之所往往泛称为“馆阁”,如北宋程俱的《麟台故事》和欧阳修以及南宋洪迈的文章中经常使用“馆阁”一词,而南宋陈騏所撰《中兴馆阁录》(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改名为《南宋馆阁录》),则直接用“馆阁”一词命名其书。由此可见,所谓“中国古代图书馆”,是指以馆阁或藏书楼形态存在的藏书之所。

馆阁有何价值?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从“形上”(道)和“形下”(器)两个角度或两个层面分别回答。这种“形上”和“形下”之分,显然来源于《易传》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语。形上之论指抽象、本体意义上的论述,而形下之论指具体、功用意义上的论述。前者为“体”,后者为“用”。这一部分从形上层面对论述,而形下层面的回答在下一部分“馆阁功用观”中论述。

由于“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概念,所以中国人普遍秉持崇道观念。确实如此,《论语·里仁》所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荀子·子道篇》所云“从道不从君”以及《国语·楚语上》所云“进退周旋,唯道是从”等语就证明了中国古人对“道”的无限崇拜及其不可置疑性。“道”是中国古人思考万事万物之规律时所使用的最具本体意义的概念,因而,“以道观之”就



是中国古人的形上思维表现。由此而言,“以道观之”的馆阁价值,就是馆阁的形上价值。以现象而言,馆阁因其藏书而成为现实的存在,世上没有无藏书的馆阁。但是,藏书本身并非馆阁的本质性价值所在,其本质性价值在于传道。也就是说,对馆阁而言,藏书是手段,传道是目的,合而言之,藏书以传道,才是馆阁的本质性价值所在。

毋庸置疑,崇道而不信神是中国古人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所以《论语·述而》云孔子一生“志于道”而从“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崇道,就要致力于存道、传道。反过来说,不存道、不传道,就算不上崇道。存道与传道之间是互为条件的关系,即无存道则无以传道,无传道亦无以存道。但我们要知道,无论存道还是传道,都不能自动实现,诚如朱熹所言“道之在天下,……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之籍。……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sup>[14]</sup>。也就是说,道不能自传,而只能靠共时性的言传身教和历时性的文献阅读来传播。就历时性的文献阅读而言,其过程就是代代相传的藏书及其利用(阅读)过程。所谓“代代相传的藏书及其利用过程”,实际上就是存道与传道的代际连续过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保存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代际连续过程。

因为“道”是观念性的东西,所以存道与传道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文献和馆阁就是这种物质基础。这表明,馆阁是存道和传道的物质设施,也就是说,馆阁的存在价值就在于存道和传道。如果没有人类的存道和传道的需要,馆阁便不会产生和存在;世上没有不存道、不传道的馆阁,所以说藏书以传道是馆阁的本体论价值所在。

中国古代“文以载道”观念的早熟,孕育出了中国古代人“以文传道”手段的早熟,文字、造纸术、印刷术的很早发明和应用,就是“以文传道”手段发达的标志。“以文传道”手段的发达,自然要求馆阁事业的发达,由此而言,馆阁是“以文传道”之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作为传道之器的馆阁,“以文传道”之业将受到极大限制,反之,馆阁之业的发达,必将有利于保障“以文传道”之业的发达。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帝王大多极其重视馆阁事业的发展。公元 992 年,宋太宗视察新建成的秘阁,“观群书齐整,喜形于色,谓侍臣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

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sup>[15]</sup>。宋太宗之所以喜形于色,是因为馆阁完成了对“千古治乱之道”的存道、传道任务,亦即完成了存道、传道之器的任务。

为了实现“以文传道”,就需要防止“文之失传”,因为对历时性传道而言,“文之失传”等于“道之失传”。为了防止“文之失传”,就需要做到“藏而不失”;而欲“藏而不失”,其最佳办法之一就是藏之馆阁。由此形成了馆阁的基本使命:藏书以传道。明人丘濬说:“书之在天下,乃自古圣帝明王精神心术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类、义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赖以知古,后世赖以知今者也。”<sup>[16]</sup>丘濬此言有两层含义,一是天下之道藏于书中;一是传书等于传道,即其所言“今世赖以知古,后世赖以知今”。所以,丘濬又说:“人君为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时之事。惟夫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焉。盖以前人所以敷遗乎后者,凡历几千百年,而后至于我,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辑而整比之,使其至我今日而废坠放失焉,后之人推厥所由,岂不归其咎于我之今日哉?是以圣帝明王,所以继天而子民者,任万世世道之则于己,莫不以是为先务焉。”<sup>[16]809</sup>丘濬这段话是在《图籍之储》一文中说的,该文的核心旨意是:历经千百年留传下来的文献,不应“至我今日而废坠放失”,所以“图籍之储”是圣帝明王应负的“先务”之责,这样才能避免把图籍的“废坠放失”之责“归其咎于我之今日”的结局。丘濬在这里指出了发展馆阁事业(图籍之储之业)是国家之责的道理。这与 IFLA/UNESCO《公共图书馆宣言》所言“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是国家和地方当局的责任”一语何其相似?在丘濬看来,图籍之储之业是“万年百世之事”,不能中断,中断则造成“文之失传”和“道之失传”,从而成为千古之罪。显然,在丘濬的图籍之储论中蕴含着“藏书以传道”的深刻识断。由此而言,现代的人们把丘濬列入“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家”行列<sup>[17]</sup>,似不为过。

“藏书以传道”中的“藏”“传”二字,其实都具有时间属性,即都具有时间上的绵延不断之义。知识和思想在时间上的绵延不断,其实是一种“记忆”的过程。人类的记忆按其载体的不同可分为个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个体记忆属于体内记忆,社会记忆属于体外记忆。个体记忆的载体为人脑,而社会记忆的载体则为能够记录和存储知识或思想的特定的体外物质载体。“道载于文”或“道藏于书”,说明文献是第一级体外记忆载体;而文献又藏于馆阁之中,说明馆阁是第二级体外记忆载体。也就是说,文献和馆阁共同起到了人类文

化的社会记忆之器的作用。未来学家托夫勒(A.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第二次浪潮文明冲破了记忆的障碍。……建造了上千个图书馆和博物馆,发明了档案柜。一句话,它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人们大脑之外,找到了新的存储方法,这样就冲破了原来的局限”<sup>[18]</sup>。有了文献、馆阁这种社会记忆之器,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就获得了在时间上绵延不断地存储和传播的可能,卡西尔把文献、馆阁的这种社会记忆功能称之为“敢于向时间的力量挑战”之举<sup>[3]316</sup>。钱穆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的民族<sup>[19]</sup>。的确如此,正是这种“惟望时间之绵延”的民族精神,造就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且源远流长的伟大壮举,说明中华民族是最善于“向时间的力量挑战”的民族。毋庸置疑,在此历史过程中,馆阁的“藏书以传道”的功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可以证明,“藏书以传道”是馆阁的历史价值与本体价值所在。

### 3 馆阁功用观:治书以供治学

上文从“形上”层面论述了馆阁的“藏书以传道”的功能及其历史价值。这一部分将从“形下”层面论证中国古代馆阁的“治书以供治学”的功能。

“藏书以传道”是对馆阁功用及其价值的宏观性、本体性概括。然而,这种宏观性、本体性功能须通过馆阁内部的具体而微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馆阁内部的具体业务活动,用现代的话来说主要为文献整理或“知识组织”(knowledge organization)活动<sup>[20]</sup>。对馆阁实践而言,文献整理或知识组织活动可称之为“治书”活动,而治书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给读书人提供治学的文献保障。由此我们可以将馆阁的功用概括为“治书以供治学”。这里的“治学”是在狭义上而言的,即指读书学习。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人中,朱熹是谈论读书治学最多的人。当年朱熹的弟子刘刚中问:“人不学,不知道。学在读书上见,道在行事上见,必读书然后可行事与?”朱熹答曰:“固也。然学即学其道,非做两节。……果于经史典籍,潜心玩索,日用云为,细意体察,自能穷天下之理。”<sup>[21]</sup>我们知道,“格物穷理”是程朱理学倡导的为学要义。朱熹说“读书是格物一事”<sup>[4]167</sup>;“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sup>[14]546</sup>。总之,读书是治学穷理的基本方式与途径,读书治学就是穷理明道的过程。在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是人们获得升迁机会的主要途径,而所谓“学而优”者主要指读

书治学优异的人,而为读书治学的人们提供文献保障,就是馆阁的基本功用所在。

馆阁的文献保障职能,主要表现为文献整理活动,包括文献的收集、抄写、分类、辨伪、校勘、编目、保护、排架、借阅等一系列工作。这一系列工作就是治书工作,中国古人称之为“校讎学”。胡朴安、胡道静叔侄二人在《校讎学》一书中指出:“校讎学者,治书之学也。……自其广义言之,则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缪,厘次部类,暨于装潢保存,举凡一切治书事业,均在校讎学范围之内。掌此职者,在古为柱下史,在后世为秘书监。其一时特设者,如汉之天禄、东观,宋之崇文、中兴,清之四库馆,特延校讎家治群书也。”<sup>[22]</sup>可见,古代的柱下史、秘书监等史官和馆职人员是治书之业的职掌者,而这些职掌者其实就是后世“图书馆员”的前身,其核心或骨干人员在古代统称为校讎家;“汉之天禄、东观,宋之崇文、中兴,清之四库馆”等馆阁是延聘馆职人员治群书的场所,即古代图书馆是治书之所。不过,胡氏二人把古代馆阁工作人员统称为“校讎家”,似有不妥之处。汉代始,秘书监下设有校书郎之职(秘书监和校书郎之间往往有秘书丞一职),称校书郎为校讎家似为对应之称。再者,自宋代始人们把馆阁工作人员普遍泛称为“馆职”,而未称为“校讎家”。后世人们一般把“校讎”和“目录”对应起来,如张尔田言“校讎者,目录之学也”(孙德谦《刘向校讎学纂微》序言),刘咸忻认为“所谓目录学者,古称校讎学”(《刘咸忻学术论集·校讎学编》),程千帆认为“治书之学,旧号校讎,比及今世,多称目录”(《校讎广义》叙录)。可见,称校讎家为目录家似更妥;而称馆阁工作人员为“馆职”似更妥。

下面仅以校勘和编目二事为例说明馆阁的“治书以供治学”的功用。

校勘文献(简称“校书”)作为治书的重要一环,其如何助力于治学,北魏孙惠蔚的一则上疏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许多缘由与原理。据《魏书·孙惠蔚列传》记载:“惠蔚既入东观,见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闻圣皇之御世也,必幽赞人经,参天二地,宪章典故,述遵鸿猷,……故大训炳于东序,艺文光于麟阁。斯实太平之枢宗,胜残之要道,有国之灵基,帝王之盛业。……而观、阁旧典,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数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褫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篇目虽多,全定者少。……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如蒙听许,则典文允正,群书大集。’诏许之。”

孙惠蔚的这则上疏,首先阐明了典籍对安邦治国的重要性,然后列举了秘书省藏书的混乱情况,包括:没有目录,新旧图书交错杂放,排列无序;部分图书副本过多,部分图书则没有抄写副本,副本比例不合理;图书品相残破,卷轴头尾破损,缺少维护;图书内容残缺,篇章次序混乱;书中文字讹误多,难以阅读;图书虽然数量多,但可阅读的本定不多。最后,孙惠蔚请求皇帝让自己领四十人校勘这些图书,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这一过程可概括为这样一个前后序列:臣僚发现藏书混乱问题→提出校书建议及方案→皇帝同意→开展校书活动。在中国古代,这种序列活动一直被当作“例则”来反复进行。正因为这是一种“例则”,所以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朝廷总是依例进行校书活动,而校书活动主要借助馆阁场所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就是一种校书事业发展史。中国古代朝廷之所以前赴后继地进行校书活动,其原因可从校书所能达到的目的得到说明。校书所要达到的目的,至少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就被校的书籍而言,通过校勘使得该书能够复原还真;二是就馆阁藏书而言,通过校勘能够提高藏书的质量,为文化传承提供尽量真确的文献信息;三是就读者而言,能够获得校勘后的完好读物,使读者免于误读或免于自我校正之苦。正因为校书活动能够实现如此多方面的良好目的,所以历朝历代的明君贤臣们都乐此不疲地重视并前赴后继地进行校书活动。据姚名达的统计,从汉代至清代各朝代朝廷组织的校书次数如下:汉代七次,魏吴两晋六次,南北朝十余次,唐代四次,宋代五次,元明二代不校书,清代校写《四库全书》<sup>[23]</sup>。姚名达的统计只是一个大略次数,实际次数要多得多,如根据汝企和先生的统计,仅南宋一朝组织的校书就有 12 次之多<sup>[24]</sup>。

从版本学的角度而言,校书的目的是为了向世人提供“善本”。关于“善本”的标准,中国古人多有论述,其中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提出的“三标准”论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缺卷,无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钞)。”从读者而言,求得善本阅读才能避免“劣版书误人”之虞。南宋人陆游曾讲有“劣版书误人”的一则故事:“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议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

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请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sup>[25]</sup>此故事中的教官因读麻沙本《易》,把“坤为釜”误认作“坤为金”,由此闹出了笑话。这是“劣版书误人”的典型案例。其实,劣版书之弊不只表现为字词讹误,还有衍文、脱简、缺页等诸多弊端,这些弊端的存在必然对读书治学者产生误读、误判等莫大隐患。由此而言,校书之“复原还真”之功,对读书治学者而言其功至伟。所以,王鸣盛说“读书必先精校书”<sup>[26]</sup>,叶德辉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sup>[27]</sup>。

编目亦为治书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的书目,无论是官修书目还是私家书目、佛教书目、道教书目等,大多是由馆阁人员借助馆藏之书而编制的。中国古代到底有多少书目?这是一个难以精确统计的事情,但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编制书目且编有数量繁多的书目作品却是可以肯定的。仅就官修书目而言,汪辟疆著《目录学研究》所附《汉唐以来目录统表》就列有 59 种书目(不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当然,实际数量应远超过 59 种。此外,在二十四史中还有 6 部官修史志目录,分别为:《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

书目对读书治学有何作用?余嘉锡曾总结有书目的六大功用:其一,“述作者之意,论其旨归,辨其讹谬”;其二,“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其三,“一书大义,为举其纲,书有亡失,览其目录,犹可想见本末”;其四,“品题得失,藉以求古书之崖略,辨今书之真伪,并核其异同”;其五,“择揅群艺,研核臧否,为校讎之总汇,考镜之渊藪”;其六,“阐明指要,资学者博识”<sup>[28]</sup>。余嘉锡所论目录之六大功用,无不有助于读书治学。从读书治学而言,目录的功用可概括为“读书之门径,博学之津逮”,诚如余嘉锡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时所云“(《总目》)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sup>[29]</sup>。我们知道,书目情报工作是图书馆的核心工作之一,而书目对于读书治学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就是馆阁价值的重要表现。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实践论功用是“治书以供治学”。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图书馆是“治书以供治学”的文化设施。试想,如果人类没有读书治学的需求,图书馆何用?对图书馆的存在而言,“有读书治学者,故我在”之说是成立的;或者说,“我在,故有读



书治学者的文献保障”之说也是成立的。由此而论,“治书以供治学”是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存在论价值所在。如果说,“藏书以传道”是中国古代图书馆的本体论价值所在,那么,“治书以供治学”是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实践论、存在论价值所在;“藏书以传道”的功用是建立在“治书以供治学”的功用基础之上的,因为如果没有“治书以供治学”的功用,那么“藏书以传道”的功用将无以实现。

#### 4 藏书流通观:“爱书须传布”

清乾、嘉时期的张金吾,其藏书楼“爱日精庐”藏书曾达到十万六千卷之多。张金吾曾购得包希鲁撰《说文解字补义》十二卷元刊本,他在为此书解题时指出,“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且予喜藏书,不能令子孙亦喜藏书;聚散无常,世守难必;即使能守,或童仆狼藉,或水火告灾,一有不慎,遂成断种,则予且为包氏之罪人。用倩善书者录副以赠。予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宝爱是书也”<sup>[30]</sup>。张金吾认为,对《说文解字补义》之类“宝如球璧”之书而言,“用倩善书者录副以赠”之法,“公诸同好,广为传布”,才是“宝爱是书”的表现,这就是他“爱书须传布”的思想观点。什么样的做法才是真爱书之举?在张金吾看来,只是珍藏并非真爱书,诚如其言“虽宝如球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何况“一有不慎,遂成断种”,反而成为“罪人”,何谈爱书?反过来,“公诸同好,广为传布”,才是真爱书的表现,因为只有“广为传布”,才能延续书之生命,亦能传播书中思想,使其“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其实,“爱书须传布”思想并非张金吾首倡,更非张金吾独有。也就是说,在张金吾之前和之后,有许多的中国古人具有藏书开放流通的思想和行动。从史籍记载看,一些人还专门记述有关于藏书流通的观点或做法。下面举其若干例。

——孔天监的“便于众,传于后”的藏书开放思想。金人孔天监有一挚友承庆(按:疑为卫承庆),山西洪洞县人。承庆曾在家乡创办藏书楼并向众人开放借阅。孔天监记其事云:“(洪洞县人)虽家置书楼,人畜文库,尚虑夫草莱贫乏之士,有志而无书,或未免借观手录之勤,不足于采览,无以尽发后生之才分。吾友承庆先辈奋为倡首,以贖书是任。……是举也,不但便于己,盖以便于众;不特用于今,亦将传于后也。……书林学海,览华实而操源流,给其无穷之取,而尽读其所未见之书。”在孔天监看来,承庆的藏书开放之举,不

仅“便于己”,而且“便于众”,能够使“有志而无书”的人得以“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这是一种“用于今而又传于后”的千秋功业。

——姚士舜的“以传为藏”思想。明代万历时期的姚士舜曾提出有独特的藏书传布思想——“以传为藏”思想。其曰:“吾郡未尝无藏书家,卒无有以藏书闻者。盖知以秘惜为藏,不知以传布同好为藏耳。何者?秘惜则箱囊中有不可知之秦劫,传布则毫楮间有递相传之神理。此传不传之分,不可不察者。……以传布为藏,真能藏书者矣。”<sup>[31]</sup>姚士舜认为,在“以传为藏”的举动中蕴含着一种“神理”,即藏书只有在传布过程中才能得到生命的延续;藏书的生命之延续在于传布,而不在于“秘惜”,因为“秘惜”总难免“秦劫”(如同秦始皇焚书之劫)的命运;只有“以传为藏”,才能算“真能藏书者”。

——曹溶的“有无相易”的开放与共享观。明末清初人曹溶,对藏书家珍藏而不轻借人之举深有感触,其曰:“不善藏者,护惜所有,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也。故人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无不绀锦为衣,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使单行之本,寄篋笥为命,稍不致慎,形踪永绝,只以空名挂目录中,……然其间有不当专罪吝惜者,时贤解借书,不解还书,改一瓿为一痴,见之往记,即不乏忠信自秉、然诺不欺之流。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特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封己守株,纵累岁月,无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那么,如何打破这种藏书封闭无闻、不轻借人的局面?为此,曹溶提出了一个称为“流通古书约”的办法,其曰:“予今酌一简便法,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较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此法数善:好书不出户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sup>[32]</sup>无独有偶,当时的丁雄飞与黄虞稷之间就签署有“有无相易”的正式协议,称《古欢社约》,规定“每月十三日丁至黄,二十六日黄至丁。不入他友。……借书不得逾半月,还书不得托人转致”<sup>[33]</sup>。无论是曹溶的《流通古书约》还是丁雄飞与黄虞稷之间的《古欢社约》,都是为了打破藏书家之间相互“秘不示人”的壁垒而推出的一种民间约定,目的是为了实现藏书的“有无相易”。这倒是互利双赢的开放与共享举措。不过这种开放与共享,仅局限于参与约定的人群(如《古欢社约》仅局限于丁、黄二人),故其作用范围

极其有限。然而,这种“有无相易”的办法毕竟体现了藏书开放与共享精神,其办法虽有局限性,但其精神无可厚非。

——宋大樽、宋咸熙父子的“借钞不吝,愿借与人”思想。清代的宋大樽、宋咸熙父子二人是藏书世家,二人都主张藏书开放观。宋咸熙曾作有《借书诗》一首:“金石之物亦易泐,况兹柔翰历多年。能钞副本亟流播,劫火来时庶不湮。翳予老病子犹痴,过眼云烟看几时。浊酒一甌何用报,先公泉下亦怡怡。”这首诗表达的意蕴是:金石以及柔翰之书,年久不免裂隙或陈旧;抄传流通才能做到“劫火来时”不致湮灭;子孙不必把守书当作“翳予老病”,不然一旦失守便成“过眼云烟”;受用我藏书者不必酬谢,因为我的这种做法会得到先祖的怡然赞许。为何作此诗?宋咸熙在诗序中记其动机曰:“藏书家每得秘册,不轻示人,传之子孙,未能尽守。或守而鼠伤虫蚀,往往残缺,无怪古本之日就湮没也。先君子藏书甚富,生时借钞不吝,熙遵先志,愿借与人,有博雅好古者,竟持赠之。作此以示同志。”<sup>[34]</sup>宋大樽、宋咸熙父子的“借钞不吝,愿借与人”的藏书开放观,确实体现了“爱物有道”“仁者爱人”的高尚精神。“借钞不吝,愿借与人”的藏书开放观,实际上是一种“与人共之”的藏书伦理观(围绕藏书而形成的人际关系规范)。其实,这种藏书伦理观在中国历史上渊源有自。据《十国春秋·鲁崇范传》载,南唐鲁崇范就认为“坟典,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据《资州直隶州志》卷二九《博雅堂记》载,南宋宇文绍奕建有藏书楼“博雅堂”,他在谈及建藏书楼动机时说:“吾家故所贮,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盍传之是邦,以为学士大夫共之。”明末人李如一会说:“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古人以匹夫怀璧为罪,况书之为宝尤重于尺璧,敢怀之以贾罪乎?”<sup>[35]</sup>明末清初的陆世仪认为,“凡有功业,皆与人共之者也,著述者无论矣”<sup>[36]</sup>。可见,鲁崇范、宇文绍奕、李如一、陆世仪等人都有“与人共之”的藏书伦理观。这说明中国古人早已有“资源共享”的观念,尽管这种共享观是朴素的、粗略的、与现代的资源共享观不可同日而语。

说到“与人共之”的藏书开放与共享观,我们自然想起明末人曹学佺的“仿释藏建儒藏”以及清乾隆时期周永年提出的“建儒藏以共读之”的“儒藏说”。因“儒藏说”在国内图书馆学界已有很多论著作了介绍和评说,故在此不再赘述。

中国古代的图书馆藏书是否开放利用?对此问

题,现代人们的普遍看法是“秘不示人”“深藏不睹”“重藏轻用”等。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这说明早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周室藏书亦可借抄。据史籍记载,宋代三馆秘阁藏书经常有人借阅,甚至出现了久借不还而亡失的现象。嘉祐四年(1059),右正言秘阁校理吴及言:“近年用内臣监馆阁书库,借出书籍,亡失已多。”<sup>[15]269</sup>政和四年(1115),措置点检秘书省官言:“三馆、秘阁自崇宁四年借出书籍,未还者四千三百二十八册、卷,久不拘收。”<sup>[15]275-276</sup>这种久借不还现象一直延续到南宋。嘉泰四年(1204)十月,著作佐郎曾从龙奏曰:“绍兴初,尝因儒臣奏请,严借书之禁,绍兴间又尝申训之,今具存也。然循习既久,士大夫视为文具,婉转而求借者甚众,久假不归。”<sup>[37]</sup>这说明,南宋朝廷馆阁虽有“严借书之禁”的规则,但并不是只藏不借,而是按规则借阅,只是因为管理不善而造成了“久假不归”的现象。至清代,乾隆皇帝指示翰林院所藏《四库全书》底本允许士人“就近检录”;《四库全书》南三阁藏本允许士人“就近观摩誉录”。这说明清代的皇家藏书亦可借抄。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楼也是普遍开放利用的。晋代范平的藏书楼“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北齐颜之推有“借人典籍,皆须爱护”一语,说明当时“借人典籍”之事已较普遍;北宋宋敏求家富藏书,当时许多士人为了借其书方便而“多居其侧”;元代藏书家冯梦周,有人借其书“损坏者不责偿,不归者遂与之”;明代藏书家李如一,别人“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等等,说明私家藏书楼之藏书是流通传布的,而非一概“秘不示人”。最典型者如宁波范钦所建“天一阁”虽规定有“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禁规,但也并非铁板一块的毫无开放利用。事实上,黄宗羲、万斯同、李杲堂、朱彝尊、袁枚、全祖望、钱大昕、汪烺、张燕昌、阮元等许多学者都曾登天一阁阅抄图书。大思想家黄宗羲更是遍访过当时江浙许多著名藏书楼,进行搜集和阅抄,故将自己的藏书之所定名为“钞书堂”。黄宗羲利用过的藏书楼包括范钦天一阁、钮石溪世学楼、祁承爌澹生堂、郑侠如丛桂堂、黄虞稷千顷堂、钱谦益绉云楼、徐乾学传是楼等,可见,明清私家藏书楼大多是供他人借抄之用的。至于寺观图书馆向信众和来访者开放,书院图书馆向学员和周围人开放,亦为人所皆知之事。这些事实都表明,古代图书馆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大多具有“爱书须传布”的思想和行动。当然,中国古代图书馆的藏书“秘不示人”的现象也是普遍



存在的,这是由当时的购书不易、文献复制技术和流通技术落后、私家藏书的私有财产性、一些人的借书之德缺失(借书污损或不还)所倒逼等原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和“人之常情”是不难理喻的。

由上可见,中国古人大多懂得“爱书须传布”的藏书流通观和“与人共之”的藏书伦理观。纵观中国古代的藏书史、图书馆史,传布利用是主流,而秘不示人并非其主流。由此而言,称中国古代图书馆为“重藏轻用”,是一种“以今论古”的、未作史实考证而得出的想当然的误判。历史的事实是“重藏重用”和“重藏重传”,只不过由于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众的文化水平亦普遍低下,在治民政策上又普遍实行严明的身份等级制,从而不可能形成向天下所有人开放流通的局面而已。如果中国古代的图书馆真的“重藏轻用”或者“藏而不传”,那么中华典籍的如此浩瀚以及民族文化的如此博大精深且渊源流传,就是不可想象的!先秦时期(或许是汉代早期)的中国人就已提出有“知而弗传,不仁也”(《礼记·祭统》)的思想,这种知识传播理念就是中国古人具有“爱书须传布”的藏书流通观和“与人共之”的藏书伦理观的思想渊源。

## 5 馆阁任职观:馆职为美职

馆阁职务有多重要?馆阁任职是否“物有所值”?馆阁职务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担任?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认识,就是馆阁任职观。

### 5.1 王充、王肃、张说对馆职重要性的认识

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提出有“馆阁任职,通人之官”之说:“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泄,大用于世。”通人之所以比儒生更高明,是因为“通人积文十篋以上,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在王充看来,兰台令史等馆职人员“怀百家之言”,治国之术无所不通(通人),因而能够“大用于世”。曹魏时期曾任秘书监的王肃,深知馆职的重要性。曹魏时期的文官系统中,掌管图书事业的秘书监隶属于掌管朝廷内务的少府。对此王肃表示不满,认为秘书监应独立于少府,且应与执掌机要的中书台平起平坐。据《太平御览·秘书监》记载,王肃当时认为,秘书监“司先王之载籍,掌制书之典谟,与中书相亚,宜与中书为官联”;而秘书监隶属于少府这种体

制安排简直是“隳朝章而辱国典”。与此同时,王肃又作《论秘书丞郎表》,要求提高秘书监内丞、郎的待遇,其曰:“秘书丞、郎俱四百石,迁宜比尚书郎,出亦宜为郡,此陛下崇儒术之盛旨也。尚书郎、侍御史皆乘犊车,而秘书丞、郎独乘鹿车,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转台郎以为秘书丞、郎之本意也。”在王肃看来,秘书“司先王之载籍,掌制书之典谟”,其职神圣而重要,若隶属于少府,便有“隳朝章而辱国典”之嫌;因为秘书“掌制书之典谟”,所以其职与掌机要的中书相仿,故秘书与中书可平等对待;秘书丞、秘书郎官秩皆四百石,带出职务亦与郡守相妨,这体现了皇帝“崇儒术之盛旨”,但秘书丞、郎只允许乘坐鹿车,还不如尚书郎、侍御史所乘犊车,且不得朝服,这又与“崇儒术之盛旨”不相符,因此应该提高秘书丞、郎的待遇。

在唐代,馆职人员的物质待遇普遍较高,如弘文馆学士“给以五品珍膳”<sup>[38]</sup>。但是,有些人对此有异议,如玄宗时期的陆坚认为,给集贤殿丽正学士以优厚待遇,“此亦何益国家,空致如此费损”。对此,张说反驳说:“圣上崇儒重德,亲自讲论,刊校图书,详延学者。今之丽正,即是圣主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所费者细,所益者大。”<sup>[39]</sup>可见,在张说的思想观念中,馆阁作为“刊校图书,详延学者”之所,表现着国家“崇儒重德”的崇高意志,所以给馆职人员以优厚待遇,不能说是“空致如此费损”,而是“所费者细,所益者大”。用现代的话来说,张说是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角度,论证了馆阁及馆职“物有所值”的重要价值。

### 5.2 馆职为“清官”“第一官”“美职”之说

自汉代始,馆阁及馆职受到人们的青睐,如东汉时学者们把东观视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sup>[40]</sup>。南北朝时,则有把馆职视为“清官”“第一官”之说。《梁书》卷三十三《张率传》和《刘孝绰传》分别记有如下两段话:“张率,字士简,……迁秘书丞,引见玉衡殿。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除秘书丞,高祖谓舍人周捨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故以孝绰居此职。”

唐开元年间,当乾曜问张说“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时,张说回答说:“侍郎自皇朝已来,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虽然,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sup>[39]165</sup>在张说看来,集贤学士和侍郎都是“美职”,但相比而言学士任职“最美”。这就是张说的

“馆阁职任最美”之说。不独有偶,唐人杜佑直称馆职为“美职”,其曰:“宋、齐秘书郎皆四员,尤为美职。……(校书郎)掌讎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sup>[41]</sup>

### 5.3 馆阁职任高标准观

馆职之所以被认为“清官”“第一官”“美职”等,是因为在中国古人看来馆职是“因书究学”或“读书穷理”的职业,是士人实现“学而优则仕”志向的最佳晋升途径。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皇家图书馆是一种“以书养人,养人以资政”的文治机构。据《汉宫殿疏》记载,萧何令建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等藏书之所的用意在于“藏秘书,处贤才”<sup>[42]</sup>。《新唐书·百官志》所记载的弘文馆的职责是“详正图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礼义轻重皆参议”。宋人范仲淹也说“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以待顾问”<sup>[43]</sup>。可见,馆阁是一个集文献整理、储养人才和咨询顾问为一体的综合性职能机构。能够胜任这种综合性职能机构的工作任务者,非饱读诗书之文人贤士莫属。

那么,如何选任馆职呢?北宋选任馆职的规定是:“直馆至校勘通谓之馆职,必试而后命;不试而命者,皆异恩与功伐,或省府监司之久次者。”<sup>[15]7</sup>这里指出了选任馆职的两种形式或途径:一为“试而后命”,可称为“试除”;一为“不试而命”,可称为“特除”(包括“恩除”和“功除”)。也就是说,“试而后命”为常例,“不试而命”为特例。需要指出的是,特除并非滥除,通过特除入职者亦须具备“异恩与功伐,或省府监司之久次”的身份或业绩条件。洪迈记述宋代馆职选任制度云:“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sup>[44]</sup>可见,宋代的馆职选任基本上采用“必试而后命”的政策。用今天的话来说,宋代已形成有较严格的皇家图书馆职业准入制度。

当然,在人治时代,这种“必试而后命”的规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潜规则”的干扰,从而有时会出现“滥除”或“衰微”的局面。因此,范仲淹在《奏杜杞等充馆职》一折中说“天下治乱系之于人,得人则治,失人则乱。……馆殿为育材之要府,岂宜贤俊不充,至于衰索?”;之所以推荐杜杞等人,是因为他们“或文词雅达,可润皇猷;或经术精通,能发圣蕴”;建议圣上“不限资任,先次召试,各补馆职”,让他们“日玩典籍,不亲米盐之务,专修经纬之业,长育人材”<sup>[45]</sup>。范仲淹在这里首先指出了“馆殿为育材之要府”的重要性,因而馆职应具备“文词雅达”“经术精通”的素养

条件;然后指出了选任馆职应不拘一格且坚持标准,即“不限资任,先次召试”;最后还建议让馆职人员“不亲米盐之务,专修经纬之业”,这样才能“长育人材”。在范仲淹看来,馆职选任是为国家养育人才的大事,因而必须按高标准选任。欧阳修对馆职选任的高标准观,比起范仲淹有过之而无不及。欧阳修曾在批评当时馆职的“恩除”“滥除”现象时指出,“不择人材,不由文学,但依例以为恩典。……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滥,本欲取重,人反轻之”,为此他建议“今后膏粱子弟既不滥居清职,则前已在馆阁者,虽未能沙汰,尚须裁损”<sup>[46]</sup>。在欧阳修看来,馆职应该是博学之士“优则仕”的职场,诚如其言:“自非识穷元本,学渐渊源,究百世之放纷,总群言而博达,则何以效官天禄?”<sup>[46]676</sup>这里的“官天禄”即指入职于馆阁。欧阳修提出的馆职选任高标准观可谓“高之又高”,非博学硕儒者均难望其项背,然而,欧阳修作为一代文豪,如此看重馆职人选的素养条件,表明其对图书馆职业准入制度的高度重视。

## 6 结语

以上,我们从文献价值观、馆阁价值观、馆阁功用观、藏书流通观、馆阁职任观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智慧。其中,文献价值观是后面四个面相的思想基础;又可以说,文献价值观和馆阁价值观共同构成后面三个面相的思想基础。若用中国古人常用的“体用一源”思想方法而言,文献价值观和馆阁价值观是“体”(本质或目的),后面三个面相是“用”(表现或手段)。由此而言,这五个面相是由价值论和实践论构成的统一整体。我们知道,杜定友先生曾提出有图书馆“三位一体”说:“一为‘书’,包括图与书等一切文化记载;次为‘人’,即阅览者;三为‘法’,图书馆之一切设备及管理方法、管理人才是也。三者相合,乃成整个之图书馆。”<sup>[47]</sup>对照杜先生的“三位一体”说,我们可以认为,本文所论五个面相中,文献价值观(文以载道)和馆阁价值观(藏书以传道)大体对应于杜先生所言“书”的范畴,藏书流通观大体对应于杜先生所言“人”的范畴,而馆阁功用观(治书以供治学)和馆阁职任观(馆职为美职)大体对应于杜先生所言“法”(管理方法与管理人才)的范畴。需要指出的是,馆阁价值观(藏书以传道)既与“书”范畴关联,也与“人”范畴关联;馆阁功用观(治书以供治学)既与“法”范畴关联,也与“人”范畴关联。也就是说,在所论五个面相中,关联“人”范畴者最多。总括而言,本文所论五个面相

是以“文”和“人”为核心的范畴体系,表明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智慧是一种“人文智慧”,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事业”(谢拉语)<sup>[48]</sup>。可以说,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为中华人文文化的高度发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智慧,是高度发达的中华民族“人文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智慧的五个面相,只是宏观意义上的简略概括,而绝非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智慧的全部。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人的文献收集、文献校勘、文献揭示(编目)、文献保护、版本鉴别、馆舍建筑等实践活动中,蕴含着极其丰富而又细微的方法智慧和思想智慧。对这种方法智慧和思想智慧的全面挖掘、总结并择优传承,就是梁启超所言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C]//中国图书馆学会. 百年文萃:空谷余音.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44-45.

[2]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9.

[3] 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4]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81.

[5] 顾炎武. 日知录校释[M]. 张京华,校释. 长沙:岳麓书社,2011:1429.

[6] 苏辙. 栞城集[M]. 2版. 曾枣庄,马德富,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566.

[7] 王符. 潜夫论校注[M]. 张觉,校注. 长沙:岳麓书社,2008:11.

[8] 陈谷嘉,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9]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 存在主义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37.

[10] 朱熹,吕祖谦. 朱子近思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4.

[11] 程颢,程颐. 二程集[M]. 王孝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689.

[12] 蒋永福. 文化、文献与人[J]. 情报科学,1990(1):48-50.

[13]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一册)[M]. 长沙:岳麓书社,1992:1028.

[14] 朱熹. 朱熹集[M]. 郭齐,尹波,点校.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4066.

[15] 程俱. 麟台故事校证[M]. 张富祥,校证. 北京:中华书局,2000:38.

[16] 邱浚. 大学衍义补[M]. 林冠群,周济夫,校点.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803.

[17] 况能富. 中国十五至十八世纪图书馆学思想论要[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4):90-96.

[18] 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M]. 朱志焱,潘琪,张焱,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4:254.

[19]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弁言.

[20] 刘洪波. 知识组织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J]. 图书馆,1991(2):13-18.

[21] 朱熹. 朱子全书(第26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457.

[22] 胡朴安,胡道静. 校雠学[M]. 长沙:岳麓书社,2013:1-2.

[23]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7-145.

[24] 汝企和. 南宋官府校勘述论[J]. 河北大学学报,2003(3):94-98.

[25] 陆游. 老学庵笔记[M]. 李剑雄,刘德权,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79:94.

[26]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黄曙辉,点校.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序言.

[27]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李庆西,标校.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08.

[28]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M]. 长沙:岳麓书社,2009:7-8.

[29]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0:49.

[30] 张金吾. 爱日精庐藏书记志[M]. 冯惠民,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12:98.

[31] 叶昌炽. 藏书记事诗(附补正)[M]. 王欣夫,补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72-273.

[32] 祁承燾. 孙从添,杨守敬等. 藏书记[M]. 扬州:广陵书社,2010:97-98.

[33] 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M]. 北京:中华书局,1982:45.

[34] 徐雁,王雁均. 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620.

[35] 程千帆,徐有富. 校雠广义·典藏编[M]. 济南:齐鲁书社,1998:459.

[36] 陆世仪. 陆桴亭思辨录辑要[M]. 丛书集成初编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62.

[37] 陈骥. 南宋馆阁录[M]. 张富祥,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8:175.

[38] 吴兢. 贞观政要译注[M]. 裴汝诚,王义耀,郭子建,等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43.

[39] 刘肃. 大唐新语[M]. 许德楠,李鼎霞,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4:11.

[40] 范晔. 后汉书(简体字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9:548.

[41] 杜佑. 通典[M]. 王文锦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8:735-736.

[42] 何清谷. 三辅黄图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339-340.

[43]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4:3434-3435.

[44] 洪迈. 容斋随笔[M]. 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5:162.

[45] 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M]. 范能清,編集;薛正兴,校点.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565-566.

[46] 欧阳修. 欧阳修文集[M]. 刘振鹏,主编. 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730.

[47] 王子舟. 杜定友与中国图书馆学[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2002:28.

1986:前言.

[48] 谢拉. 图书馆学引论[M]. 张沙丽,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 The Wisdom of Library Science in Ancient China

Jiang Yongfu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s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librar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long history, the ancient Chinese have accumulated extremely rich library practical wisdom and ideological wisdom.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wisdom of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Liang Qichao research on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Method/process] Using the value analysis method and function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mpos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thinking. [Result/conclusion] The 5 aspects of library science wisdom of ancient Chinese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documents are used to store the “Tao”, which reflects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values;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is to spread the “Tao”, reflects the library values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 organizes the literatur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use, focusing on the library function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 love books must spread it, reflecting the collection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 in library collection; library occupation is a beautiful profession, which reflects the library professional values of ancient Chinese.

**Keywords:** the wisdom of library science ancient China

### “名家视点”第 8 辑丛书书讯

由《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精心策划和主编的“名家视点”系列丛书第 8 辑已正式出版。该系列图书资料翔实,汇集了多位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智慧,观点新颖而富有见地,反映众多图书馆学情报学热点和前沿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对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探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可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及相关学科的教学参考书和图书情报领域研究学者和从业人员的专业参考书。该专辑的 4 个分册信息如下,广大读者可直接向本杂志社订购,享受 9 折优惠并免邮资。

- 《智慧城市与智慧图书馆》(定价:52.00)
- 《面向 MOOC 的图书馆嵌入式服务创新》(定价:52.00)
- 《数据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定价:52.00)
- 《阅读推广的进展与创新》(定价:52.00)

欢迎踊跃订购!

地 址:北京中关村北四环西路 33 号 5D 室

邮 编:100190

收款人:《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

电 话:(010)82623933

联系人:谢梦竹 王传清